

古典心靈的現實轉向： 上海新聞紙與中國現代性的發生

• 卞冬磊

摘要：1895年是中國現代化轉型的開端。本文運用閱讀史的方法，通過梳理晚清若干讀書人的日記，試圖呈現中國現代化轉型初期「事件」和「人心」之間的關係。本文的研究發現：「新聞紙」（報紙）這一「現代文化形式」，伴隨甲午戰爭進入讀書人的閱讀世界，它將人們的注意力從儒家典籍和古典學問所主宰的「前人世界」引向劇烈變遷之中的「共同世界」。以報紙為主體的現代大眾傳媒，促動了中華帝國讀書人「古典心靈的現實轉向」，並形塑了一種超越儒家經世思想、「追求現在、關懷國家」的新現實主義精神世界。

關鍵詞：新聞紙 大眾傳媒 晚清讀書人 公共領域 現代性

世上沒有神運算元，可準確預測危機爆發的臨界點。無人料及，1894年秋天的一場戰爭，將中華帝國編織進現代性之一長串豐富而痛苦的故事裏。作為中國近代思想轉型的開端，1895年的重要意義已有學者作出不少討論^①。不過，在歷史書寫中，尋常人的心聲甚少傳出，「事件」和「人心」之間的媒介亦未受檢視。此事並非細枝末節，對尋常識字人來說，現代性故事的主要講述者，除邸報、私信和耳聞目見外，還增加了「新聞紙」（報紙）這個新成員。若無這一「現代文化形式」^②，人心世界恐怕難以發生如此巨大的轉折，中國的現代轉型可能還要遲滯許久。

論述報紙與現代性的文字可謂汗牛充棟。以晚清為例，當報紙與制度勾連時，它往往逃不過「公共領域」的概念，「學校、報紙和學會，構成了近代中國的公共空間」，「在於獨立政治建構之外形成公共交往和批判性的公眾輿論」^③；

* 本文為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閱讀公眾的興起：晚清報刊閱讀史研究（1894-1911）」（項目編號：13YJC860003）的研究成果。感謝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吳仰湘教授對本文涉及《師伏堂日記》之史料部分的幫助。

而涉及理念時，報紙則是「傳遞現代思想、理念和知識最重要的媒介」^④；此外，「報人」群體常被放在傳統士大夫向現代知識份子轉型的洪流中予以審視，就如他們的先輩王韜一樣，報紙是文人「自我實現」的新方式^⑤。

與已有的研究不同，本文的觀察對象是讀報的平凡人。1895年前後，他們既無一官半職，亦無超前的思想，是散落於社會之中、隨處可見的讀書人之一份子。此一取向，西方學界亦有所涉獵。最常見的觀點指出，讀報能激發政治意識，培養普通民眾批判現實的精神。僅以文化史大家伯克 (Peter Burke) 為例，他指出，在十五至十八世紀的西歐，印刷品的傳播「讓公眾的態度發生了兩個逐漸而重要的變化：世俗化和政治化」；其中，報紙使「國家事務與人民生活的關係更緊密」，讀者變得「過於關注現實，吹毛求疵，〔報紙〕不但給予他們干涉政府的願望，而且給了他們這樣做的一種貌似有理的權利和認可」^⑥。

另一批研究則發現了與「想像的共同體」類似的心理機制，讀報因而與現代民族國家意識得以相聯。如人類學家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的描繪：「報紙的讀者們在看到和他自己那份一模一樣的報紙也同樣在地鐵、理髮廳，或者鄰居處被消費時，更是持續地確信那個想像的世界就植根於日常生活中」；互相連接的「讀者同胞們」，「形成了民族的想像的共同體的胚胎」^⑦。

在傳播領域，勒納 (Daniel Lerner) 以社會學的方式，揭示包括報紙在內的大眾傳媒，對中東傳統社會造成的瓦解。勒納說，傳統人「沒有能力想像除了自身立足之地以外的任何事務，而臣服於他們的天命」；而新聞培養「移情」的能力，「激發人們思考自身經驗以外的事物」，因而，「國家取代地方，成為認同的中心，人們也參與到愈來愈多的國家事務中」^⑧。

上述研究從政治意識、民族國家、移情能力等角度粗略地勾勒了讀報帶來的現代性。然而，近代中國的新聞紙並非誕生於工業化、都市化的語境，讀者的精神氣質亦與世俗化進程中的西方人有顯著不同。新聞紙與中國現代意識的發生、過程與結果有何特別關係？本文即用閱讀史的方法，以晚清幾位讀書人的日記為史料（《忘山廬日記》、《師伏堂日記》、《蔡元培日記》、《張桐日記》^⑨，以下引用只註日記名稱及頁碼，涉及日期均為農曆），通過具體而微的閱讀碎片，嘗試回答這一問題。這幾本日記成為本研究之主角，純屬歷史的偶然，晚清日記浩如煙海，能夠被保存、搜尋、出版和研究的本就寥若晨星。但本文與它們的相遇也是人為製造的緣份，它們首先均跨越了1895年這一時間節點；其次，它們往往偏好記錄閱讀行為及感受，而不僅是日常活動的流水賬。此外，這些日記的主人除喜好閱讀和交往外，還分別散佈於京城、內地和沿海，有益於向我們呈現他們五彩斑斕的日常世界。

一 以「前人」為導向：讀書人的生活世界

（一）讀書交友

1893年十一月初二日，北京讀書人孫寶瑄(1874-1924)寫下了人生第一則日記：

晨，陰。……晝晷短極，倏忽已昏暮。晏起，讀《左傳》。晡，閱《明紀》。夕，讀謝希逸《月賦》，觀郭景純《遊仙詩》、左太沖《招隱詩》及謝康樂諸紀遊詩。（《忘山廬日記》，頁1）

氣象、起居和閱讀，呈現出讀書人的日常生活。很幸運，衣食無憂的孫寶瑄成為優雅紳士，以讀書為頭等大事，甚至還看破了「科舉紅塵」——「知其不可必得，故視之甚淡耳。」（《忘山廬日記》，頁36）。

不為科舉的讀書，或更接近讀書的本義。在儒者眼裏，讀書「不僅是一種直觀意義的閱讀書籍或與技術性或技能性學習相關的行為，它更可能是強調一種不那麼功利、目的性不那麼具體的超技能的持續學習」^⑩。從1893年末到來年四月，孫寶瑄的視線從未遠離《左傳》、《明紀》、《明史》、《漢書》、《文選》等典籍。

日復一日的古籍閱讀將人帶向何處？除了向前人學習外，「歷史」是孫寶瑄另一流連忘返之地。譬如，1893年十一月十五日，孫寶瑄讀《明紀》後寫道：

初，建文帝御左右嚴，成祖北來，中官竊出，漏京師消息，成祖以為忠於己，即位後，遂委以事權。嗟乎，成祖以一時淺識徧見，遂啟一代禍亂之階，抑何其不仁也！（《忘山廬日記》，頁6）

此類以「忠孝仁義」為標準、評價歷史人物的讀後感，在日記中俯拾皆是。不過，議論止於就事論事，事和人都規矩地安置在「過去」那個孤立的時刻，很少蔓延至「現在」。經、史之外，吟詩誦賦等文人雅興，自不缺少。或是觸景生情，孫寶瑄常在「寒星滿天」或「月初露」時吟誦詩文，不免評頭論足，所記大抵「詞旨清朗，文采明麗」、「吐屬雅飭」、「筆少曲折，不耐尋味」，頗有文藝批評的神韻（《忘山廬日記》，頁1、23、27）。

最值得注意的是，短短兩月間，曾被西方人過譽為「忠實、具體和詳細地報導了帝國內的一切事務」^⑪的邸報在孫寶瑄的日記中曾現身五次。不嫌繁瑣，照抄如下：

1893年十二月十七日：始聞許星翁之沒於前月廿九夜，今已半月餘矣。因命僕持邸報觀之……（《忘山廬日記》，頁14）

十二月二十六日：閱昨來邸報，周福清已定案斬監候。（《忘山廬日記》，頁18）

1894年正月初三日：閱邸報：元旦慶賞，凡軍機、內廷、六部尚書侍郎以下，有賞紫纒者、宮保銜者、雙眼翎者、黃馬褂者、交部議敘者，各有差等，不可勝數。（《忘山廬日記》，頁22）

正月十五日：閱邸報，孫京兆果以屢被參劾，開缺另補候簡用。順天府尹着陳彝補授。（《忘山廬日記》，頁31）

正月二十三日：燈下覽邸報。日來朝廷殊有振厲氣象，屢讀上諭，語皆嚴峻可畏。（《忘山廬日記》，頁35）

作為官宦子弟，孫寶瑄接觸邸報不算困難。明清之際，除官府外，邸報衍生的「小報」，「相當普遍地流傳於社會中，成為一般知識份子與聞全國性事物的依據」^②。客觀而言，迥異於典籍，邸報將讀書人帶入當代世界，就如蘇東坡詩云：「坐觀邸報談迂叟」——通過邸報知悉司馬光的行為一樣，孫寶瑄也在邸報中與當今皇帝、官員相遇。不過，邸報大多刊登朝廷諭令及奏章，似無太多值得在日記中書寫的內容。

閱讀之外，孫寶瑄最重要的活動是社交。1894年初始，孫氏兩兄弟便談起詩文：初二日，「大哥……謂古風雖不拘平仄，任意揮灑，而亦有一定音節」（《忘山廬日記》，頁21）；初三日，兩人欣賞辭舊迎新之作。正月十一日，孫寶瑄與另一友人「倚裳對榻，談詩，談古文，談人事，談物理，語刺刺不休」（《忘山廬日記》，頁26）。與友人交往的記錄在日記中極為詳細，不必堆積全部引文，用「以文會友」描述這一狀態，應屬大致不差。儘管偶有涉及當時的談話，但讀經書、品歷史、賞詩文，才是孫寶瑄生活世界的主要內容。

（二）趕考坐館

1894年正月初十日，湖南舉人皮錫瑞（1850-1908）登舟前往北京趕考，此行漫漫，十四歲就成為生員的他，此時仍未流動到科舉階梯的頂端。舟中生活單調乏味，研讀《史通》、《莊子》、《禮書》等科考讀物佔據了皮錫瑞的主要精力。在京城月餘，備考中的他既緊張、又無聊，關心的則是考題、風氣和同窗。四月初八日，皮錫瑞讀到一份「京報」：

閱京報，見文道希以侍讀學士用，秦陸講學，戴、陳庶子，廉生與野秋先生侍讀。……新放四川鹽茶道玉□〔原稿空缺一字〕以召對不稱，改同知，可謂英斷。廖仲師放欽差，到四川查辦事件，不知何事。（《師伏堂日記》，第一卷，頁440）

京報是邸報的民間化形態，內容「限於宮門抄、上諭和奏章等」^③。其讀者群體十分廣泛，除官紳和士大夫外，一般人亦可購買。只是，此報留給皮錫瑞的印記，仍是科考和官員任免等朝廷事務。

會試不中，皮錫瑞回江西南昌的經訓書院講學，在中轉上海的五天裏，購物、聽戲、參觀，穿梭於「傳統」與「現代」之間。作為上海現代性的標籤之一，四月二十七日的畫報竟「無新聞」；四月二十八日，才「見新聞紙，散館頌年高列，趙止生亦在一等，俞伯鈞二等二名，洪毅夫亦前列，四人必留」（《師伏堂日記》，第一卷，頁447-48）。報紙的內容五花八門，不過最受皮錫瑞關注的仍是科舉。這也無甚奇怪，對許多人來說，上海新聞紙描述的新事物固然有趣，但更重要的是，它們成為獲取上諭或科舉這些老套消息的新方式。

五月十九日，坐館教書生活開始，皮錫瑞每日批改課卷，與人交談，書院裏充滿學問氣息：六月初一日，「陳庚山來，談《公》、《穀》經義」（《師伏堂日記》，第一卷，頁461）；初三日，「芟齡夜過談，以所作詩見示。詩穩練，

有功力」(《師伏堂日記》，第一卷，頁463)；初四日，「盛學使以賦數十篇、駢文數篇請改」(《師伏堂日記》，第一卷，頁463)。此類場景頻現，卻無任何一條關於現實世界的討論。

如是，無論趕考或坐館，讀書人基本上都要遵從儒家學問而讀。張仲禮指出，「康熙年間，科舉還包括一些現實問題，如吏治和河工，但十八世紀以後，策問開始討論哲學問題，考生不容再討論現實問題」；到十九世紀科考內容則全為儒學經典，「考生的成功在於知曉嚴格的格式、規定、韻律和措辭方式來作文，並且詞賦須華麗，卷面須整潔」^⑭，考生無暇、也無必要顧及現實世界。對此，韋伯說得在理：「中國的考試是要測試考生的心靈是否完全浸淫於典籍之中，是否擁有在典籍的陶冶中才會得出的、並適合一個有教養的人的心術。」^⑮

(三) 美風化俗

浙江溫州秀才張櫚(1860-1942)，功名雖低，但或因居於沿海地區，卻似比孫寶瑄、皮錫瑞兩人對外界多一分敏感。1889年，他就有閱讀報紙的經驗：

報中又詳言近日各處匪徒鬧事，焚毀夷人教堂。湖北之武穴，安徽之蕪湖，又有安慶、鎮江、南京、丹陽、九江等處。(《張櫚日記》，頁17)

這條記錄的不尋常之處在於，它既超越耳目所及，又跨越了狹窄的「朝廷」，而進入到具體的「天下」事務。然而，這只是曇花一現，「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像張櫚這樣的地方士人，積極參與各種慶典，守護鄉間文化，才是生命的意義所在。

由於日記刪減嚴重，張櫚的閱讀世界略顯模糊。1891年四月初一日，讀《曾文正公家書》：「……錄於後備覽：課程，主敬，靜坐，早起；讀書不二；讀史，寫日記，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謹言，養氣，保身，作字，夜不出門。」(《張櫚日記》，頁16)五月二十三日，從袁枚《隨園詩話》摘錄的兩段格言——「為人不可不辨者」、「作事不可不辨者」(《張櫚日記》，頁18)，成為張櫚自省修身的尺規。兩則記錄，大概可以呈現一個試圖通過內省修身、達成理想儒者之讀書人的初步輪廓。

即便只是秀才，張櫚亦結識了孫衣言(號琴西)這樣退居鄉里的大儒，一如孫寶瑄、皮錫瑞二位，他們探討的通常不是國家大事，而是詩文典籍，如1891年的幾則日記：

四月二十八日：予與之〔琴西先生〕促膝高談，……所談皆《史》、《漢》及國朝古文門徑。(《張櫚日記》，頁16)

九月十八日：琴西先生命人持名片來要予去，……因共談古人並《史記》，約至二更始返。(《張櫚日記》，頁20)

九月二十一日：早晨至琴西先生處閒談古文詞並詩、時文。(《張櫚日記》，頁21)

張桐的個案，顯示了地方讀書人的閱讀和交往世界，與京城、省城的讀書人一樣，主要逡巡於「前人世界」。分散各地、彼此不知的三位，身處儒家典籍規範的知識共同體，擁有着相似的生活心態。

加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說，經典「是某種對抗歷史批判的東西」，「它的那種負有義務要去流傳和保存價值的力量，都先於一切歷史反思並且在這種反思中繼續存在」。換言之，經典是「一種無時間性的當下存在」^⑥。訴諸中國，那些「由原始經文和對其所做的詮釋構成的傳統」，成為「規範性的延續，將逝去一代與活着的一代連接在社會的根本結構之中」^⑦。因而，從以上案例所見，晚清讀書人的心靈世界，甚少出現同代人、而甚多是前人的身影。以前人為導向的生活，「絕不是實質地影響他人的行為，而是受他人所影響的行為」，「那些前人世界的以往體驗以過去完成時的方式被我詮釋為當下行為的真正原因動機」^⑧，個人只需「學會去理解和選擇持續了幾個世紀之久的傳統行為模式，並隨着世代的更替而稍稍糾正一下」^⑨。其結果是：當時的讀書人無力或無意以自身、當下為導向，而偏向實踐經典中流傳下來的價值，因而，其生命體驗偏向「過去」而缺乏「現實感」。這種傾向，直到甲午戰爭開始後，才發生轉向。

二 古典心靈的現實轉向

(一) 京城的消息來源

「倭人輦轡，屢有鋒鏑之警，長安居者，遷徙紛紛，以是心緒惡劣。」(《忘山廬日記》，頁55) 1894年五月，孫寶瑄的日記中斷，至十一月二十五日復作。或為巧合，或為刻意，當日閱讀便呈現新氣象：「讀湯蛰仙大令所撰《危言》一書，專論時務，洋洋灑灑……足以辟中朝士大夫數百年之蒙蔽，惜不令當局者見耳。」(《忘山廬日記》，頁56)

從此時起，孫寶瑄對經史詩賦的熱情並非完全拋開，不過，對時事的注意力有所增長也是事實。1894年末，孫寶瑄連續追蹤甲午戰事、議和，頻繁記述如「聞張樵野侍郎今日啟行，由山海關登輪詣倭議和」之類的消息(《忘山廬日記》，頁62)。十二月二十日，他終於按捺不住，將議論化作行動：「晚，作上岳父書，議論時事，約千餘言。」(《忘山廬日記》，頁64)

此外，「以文會友」的場景亦大大減少，「時務」、「時局」、「時事」等字眼競相浮現於孫寶瑄的日記，如：

十二月十二日：余乘馬車過湯蛰仙，談時務良久。(《忘山廬日記》，頁62)

十二月二十七日：飯後，訪李梅孫，渠新選安徽青陽縣，時梓泉、厚庵、地山皆在，議論時事。(《忘山廬日記》，頁66)

不過，日記未能標明「時事」消息的來源。唯一確定的是，1894年末，孫寶瑄已置身於一個「時事」密度顯著增加的新環境，這或與非常時期的邸報、人際

網絡有關，但更可能是新聞紙的功勞，因為日記記錄的戰事、議和之具體動態，似非傳統消息網絡所能及。如：

十二月十五日：聞倭人又增精銳萬餘人，皆東行。日間恐奉天告急，張樵野侍郎雖已首塗，尚未抵其國。時事如此，不知作何了結。（《忘山廬日記》，頁63）

十二月十八日：聞蓋平失守，王師又敗績。此信頗確。又聞張樵野於十六日自津啟行，倭人亦派大臣……（《忘山廬日記》，頁64）

十二月二十七日：昨在新吾處，聞日本攻威海可危，今日聞榮城已不守。時局如此，奈何，奈何！（《忘山廬日記》，頁66）

讀書人關心時事，孫寶瑄並非孤例。1894年六月十三日，身在翰林院的蔡元培（1868-1940）通過閱讀《新聞報》（1893年於上海創刊），第一次了解到朝鮮局勢：「二十七日報謂：日人已發哀美敦戰書，訂期於昨日十二下鐘開仗，據此，則中日已構兵矣。此間杳不得消息，未知若何。」（《蔡元培日記》，頁3-4）據此推斷，他閱讀的是半月前的《新聞報》，對五月二十七日以後的局勢，尚無從知曉，側面反映傳統消息網絡的不暢。自然，蔡元培也有閱讀邸報的機會，但除了七月初一日摘錄「開戰」上諭外（《蔡元培日記》，頁10），邸報似乎並未提供關於戰事的任何進展。

到了九月，消息來源終趨於穩定，《滬報》（1882年於上海出版）進入了蔡元培的閱讀世界，戰爭的實際進程一一鋪陳開來：

九月十三日：閱九月二日滬報，稱俄報有論，懲惡英、法、俄各大國割分中國之地……（《蔡元培日記》，頁20）

九月十七日：四日滬報八月十八日鴨綠江之戰，倭人第一隊最大捷，堅船七艘沉其二。第二隊二等船五艘一沉一焚……五日滬報倭軍於一日派兵五千，從高麗東北海岸口登岸……（《蔡元培日記》，頁22）

此類消息，綿延數月。我們可說，是現代新聞紙而不是邸報，賦予了人們與戰爭保持同步的可能性。翰林士人悠然的生活，因新聞紙而激起千層浪。蔡元培寫道：「倭事傳聞款議將成，貽兵費二萬萬……謂和議不可恃，朝鮮不可棄。」（《蔡元培日記》，頁23）當協定簽署的消息傳來，蔡元培則「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蔡元培日記》，頁31）。

（二）從江西到湖南的「時事之網」

1894年六月二十四日，皮錫瑞和友人第一次談及朝鮮事：「鄒殿書至，談洋務，云英國或出排解，朝鮮想不至大決裂。」（《師伏堂日記》，第一卷，頁475）話匣子一經打開，便無法停頓，討論時局立刻成為首要議題，原本談詩說文的書院生活，驟然間被「痛言時事」、「談時事」、「言國事」所佔據，譬如：

六月二十八日：晚間夏鑒臣、少村叔侄同至……聞……東洋已開仗，互有勝負……（《師伏堂日記》，第一卷，頁477）

七月初一日：晚間至殿書處，談海上戰事……（《師伏堂日記》，第一卷，頁481）

七月初二日：殿書早至，云吳淞口炮台之炮，已為奸細以鎊水淋壞……中國諸事落後，可為扼腕。（《師伏堂日記》，第一卷，頁481-82）

此時的消息來源還不夠明朗。七月十二日，謎底解開：「見《申報》言海上戰事，陸戰多勝，海戰互有勝敗。」（《師伏堂日記》，第一卷，頁487）九月初四日，在江西散館回鄉的客船上，皮錫瑞一改過去依靠詩文度日的習慣，代之以《申報》作伴，並隨時將時局變化寫入日記，如「報云平壤失守，李相亦得處分，甚有譏諷之詞」（《師伏堂日記》，第一卷，頁522）。

回到湖南，不出二日，皮錫瑞就急切地與友人相談時事，九月十八日，「見俞伯鈞，談京師事」（《師伏堂日記》，第一卷，頁526）；九月二十五日，「至孔搢陔處，談時事甚悉」（《師伏堂日記》，第一卷，頁530）。可見，這場戰爭確已成為當時讀書人心中的頭等大事。十月二十四日，皮錫瑞在長沙獲得《申報》，記錄評論「恭王督辦軍務」、「俄皇死，法民主被刺」等消息（《師伏堂日記》，第一卷，頁543），自此讀報成為家常便飯。

報紙進入閱讀世界後，遙遠的戰爭不再處於「私下」狀態，而是正在進行着的「公開事件」。閱讀這些消息，皮錫瑞的心情隨之起伏：既有「不知何以不用兵船」的質疑，也有對京師中人「鋪張如舊」的寒心；既有「誠不料大局至此」的失望，又有「論時事，扼腕久之」的激憤（《師伏堂日記》，第一卷，頁487、537、538-39、540）。這些交織混雜的情感成為他批判現實的導火索：「感戰事，作五律八首」、「作《兵車行》，痛言時事」（《師伏堂日記》，第一卷，頁524、544）；即便是與戰爭無關的新聞，也令人想到悲慘的現實：「現已兵臨城下，兩宮有隙，亦當容忍。如此舉動，愈為敵人窺破矣。以詩書禮樂之邦而內亂，何以能國？」（《師伏堂日記》，第一卷，頁552）

（三）鄉里空間的迴響

與戰場地理距離十分遙遠的張櫛，憑藉零散的報紙消息，亦能了解戰事的實際進程。1895年二月十三日記：「昨閱《申報》，旅順及山東威海衛均被奪，中國兵輪均被轟沉，一二員大員逃者逃，殺者殺，而人民遭其屠戮者更不可勝計。」（《張櫛日記》，頁23）四月初六日，他又接到郡城親友寄來的《申報》，獲知了議和的「確音」：

據三月間《申報》云：「李鴻章為全權大臣出使日本議和（略），近已得議和確音，謂朝鮮及旅順、威海衛等所失之地，均永歸日人管轄，南省澎湖、台灣亦永歸日人管轄，並賠日人兵費洋三百兆兩，分作七年交清。」（《張櫛日記》，頁24）

「確音」一詞，恰是閱讀報紙的獨特體驗。有了對時事的確切知曉，思慮才不至漫無邊際。如塔爾德 (Gabriel de Tarde) 說，報紙使「同時進行的許多談話在內容上日益相似，在地理上日益擴張」^②，張櫛的生活世界亦發生着「談詩說文」讓位於「縱談時事」的變化。「閱竟為之一歎」、「如此割地求成，雖小國尚且恥之，況堂堂中華乎」、「李合肥誤國之罪，較之秦長腳〔檜〕殆有甚矣」（《張櫛日記》，頁24）等字句，表露的失望和批判力透紙背。

張櫛的經歷說明，1894年，新聞紙已滲透到東南沿海的鄉里空間，進入了下層讀書人的閱讀世界。資訊帶來的便利，抹去了地理、功名和身份的差異，使他與孫寶瑄、皮錫瑞、蔡元培等人，共同經歷同一個世界。

三 回首「確音」難求的時代

身處資訊過剩的環境，今日我們對1895年以前的時事網絡之現代意義已失卻敏感，要了解晚清讀書人現代意識的誕生，唯一的辦法是回到資訊匱乏的年代，感受一下新聞紙誕生前人們的生活狀態。

1644年三月初八日，明代崇禎皇帝在北京煤山自縊，這是一件具有「亡天下」意義的大事。其時，身處無錫的史家計六奇記錄了自己的親身體驗^③：

四月廿七日，予在舅氏看梨園，忽聞河間、大名、真定等處相繼告陷，北都危急，猶未知陷也，舅氏乃罷宴。廿八日，予下鄉，鄉間亂信洶洶。廿九日下午，君徽叔云：「崇禎皇帝已縊死煤山矣。」予大驚異。

這三日的記錄說明，事件發生一個多月後，江南讀書人仍處歌舞昇平之中。正如巫仁恕所說：「江南因為未受兵害，再加上新聞傳播較慢至該地，所以江南地區的人們一直都未意識到明政府已岌岌可危。」^④司徒琳 (Lynn A. Struve) 寫到，當時南京兵部尚書聽到傳聞，「立即會晤其他高級同僚，發布檄文，着手集合勤王軍隊。但是他們隨即便不得不考慮：要把這支軍隊帶入何種境地？南方局勢不穩，北方情況亦未明朗」^⑤。官員尚且如此，普通人就更難免受制於消息的不確定。

再將視線轉回清中葉。1840年的鴉片戰爭，其重要程度不輸甲午戰爭。可當時大部分中國人對南方戰事毫不知曉。幾位在北京的俄國人說，「清朝統治者『小心隱瞞』，在報紙上幾乎不發表任何對英戰事的消息」，因此，他們「關於對英戰爭的情況，一無所知。中國官員避談此事，而蒙古百姓中只流傳一些關於戰事的模糊傳聞，他們甚至跟誰開戰都不知道」^⑥。平常百姓消息不通或可理解，可翰林院進士曾國藩同樣不關心此事。此段時間，寫《茶餘偶談》幾乎佔滿了他的日程表^⑦。這與傳播系統的不發達不無關係，正如茅海建所說^⑧：

由於奏摺是機密的，邸抄〔邸報〕公佈的消息有限且屬內部發行，民間書信因耗資昂貴（時無郵局，只有私人機構）而數量不多，大眾傳媒尚未出

現(只有來華外國人的英文報刊),因而南方的戰況,似乎只是由專業化或業餘包打聽在京城地面巨室大戶之間播弄。老百姓很少知道此事,甚至一些官員也置身事外。

奏摺、邸報與書信,再加上流言網絡,構成了中華帝國中期以前的傳播體系。生活於其間,人們很難獲得超越自身立足之地的確切資訊。「未知確否」、「不知所終」這類經常出現的字眼,大概反映出前現代傳播體系中人們的普遍狀態吧。

鴉片戰爭數十年後,一個重要的轉化是現代新聞紙的出現。特別是1872年以後,《申報》的持續出版,在東南沿海培養出一個緩慢增長的讀者群。1884年中法戰爭期間,《申報》更派出一名戰地記者,用電報第一時間發回戰況,使這場戰爭沾染上現代「媒介事件」的色彩。瓦格納(Rodolph Wagner)說:「由於《申報》和香港中文報紙的存在,使這場發生在越南的戰爭實際上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場公共的戰爭。」^②

那時,郭嵩燾、翁同龢、曾紀澤、張謇等讀書人,均是《申報》的讀者。這群人中不乏朝廷官員,接觸邸報並不困難,為甚麼還要閱讀聲名並不算高的《申報》呢?且不說邸報只錄「朝廷之政事,不錄閭里之瑣屑」^③,當它面對變化極快的戰爭時,其內容受限、傳遞緩慢,足難令人忍受。太平天國期間,進士黃琴塢曾說:「從前邸抄不禁,因賊蹤南北紛竄不定一語,人心皇皇;近又一切事關軍情者,密而不發,轉茲疑懼。」^④此語準確地反映了邸報的缺陷。瓦格納亦指出:「清朝的官方奏報是基於舊的資訊流通結構依然存在的狀況下,需要花上好幾個月才能判斷地方官或將領的報告的真偽。現在奇妙的是,朝廷自己也變成了讀者群的一份子,只能夠(而且的確)在《申報》和其他西方報刊中讀到局勢的進展。」^⑤所以1884年前後,新聞紙順勢而長,起初是「都中人因邸抄中並無安南各事,故爭欲購觀華字新聞紙,以知消息」;隨後,「法事肇興,京報局中大為虧累,……斷爛朝報竟至問鼎無人」;而《申報》則「銷數益暢旺」^⑥。

不過,一個令人困惑的現象是,為何1894年初,在本文所引諸君的日記中,並無多少現代新聞紙的蹤迹?這或與中國讀書人的精神氣質及其對報刊的觀念有關。竹內郁郎說:「識字的都市工人們,隨勞動條件改善、生活水平提高而逐漸成為巨大的資訊需求層,成為十九世紀作為大眾傳播媒介登台的大眾報紙的幾萬乃至幾十萬讀者。」^⑦誠如其言,以刊登新聞為主的大眾報紙,一般是工業社會發展的結果^⑧。可是,在中華帝國,報紙面對的識字階層,卻與西方都市人大不相同:他們不是工商主義者,也非要求政治平等的中產階級,而是受到儒家文化薰染的文人學士。在理想形態上,他們輕視經濟,視儒家學問為唯一的信仰。因此,由洋人辦理、追求利潤的通商口岸報紙,因與學問無涉,便很難對他們的精神世界產生影響。也許「彼時社會以帖括為唯一學問,而報紙所載亦多瑣碎支離之記事,故雙方愈無接近之機會」^⑨的描述,更接近尋常讀書人對待報紙的心態。

因而,在波瀾不驚的1894年初,讀書人依然沉浸於閱讀典籍,甚少關注現實,就具有合理性。可到了下半年,他們就主動尋求新聞紙,此種心態的遽然轉折,若非戰爭這一關乎天下命運的大事,便不可能出現。

四 現在/國家：新聞紙對「社會世界」的重構

上文常常使用、卻未經解釋的「前人世界」一詞，來自社會學家舒茨(Alfred Schutz)對人類之「社會世界」的劃分——「前人世界」(world of predecessors)、「周遭世界」(face to face relationship and interaction)和「共同世界」(world of contemporaries)。舒茨的理論中亦包括「後人世界」(world of successors)：「一個在我的生命終結之後將由其他我居住的世界。」不過舒茨對其論述甚少³⁵。此處，筆者將借助舒茨的理論，說明新聞紙對晚清中國讀書人的特別意義。

舒茨說，在「周遭世界」，與我們相遇的是「鄰人」(fellow-men)，他與我「在時間和空間上共存」³⁶。如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所說，周遭世界就是「對日常生活的特殊對象(家具、房屋、市區、其他的人們等等)的親知」³⁷。在舒茨所說的「前人世界」，我們與前輩(predecessors)相遇，「前人世界，又稱為歷史，對這個世界，我只能觀察而不能行動」，因為它「在原則上和本質上乃是不變的、完成的和成為過去的」³⁸。對人類集體生活更重要的是「共同世界」，在這裏，我們和「同時代人」(contemporaries)相遇，雖然「他的身體固然不呈現出來，也就是不具有時間和空間上的直接性，但是我知道他和我共同存在，他的意識體驗和我的意識體驗一同前進着」³⁹。同時代人主要有兩類：一類是「具有特定功能或社會角色的他人，他不曾以具體的個人現身，而是以特定的類型出現(如警察、郵差)」；另一類是「社會集合體」，即如「國家」、「報業」、「經濟」、「民族」、「人民」或「階級」等組織機構⁴⁰。

顯然，新聞很少報導「周遭世界」、「前人世界」，除非那裏發生了對「共同世界」具有意義的變化。新聞主要關心同時代人及其行動；而且，新聞很少描述「共同世界」的靜止結構，卻隨時報告它的外顯變化，即塔爾德所說的「當前令人人興奮的問題」以及「每天波動的情況」⁴¹。

作為歷史的產物，報紙的出現，導致了「前人」、「周遭」和「共同」三世界的關係重構。曾幾何時，人類全然生活在以「周遭世界」為導向的情境中，很少遇到陌生人，「行動的空間」是唯一的社會世界⁴²；中世紀的漫長歲月，人們在各類神聖、典籍和規範下生活，「只能在一個有限的空間內對自己的明確的生活目標進行選擇，從而決定自己的命運」；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以後，現代性的「去魅」，使人「不再像傳統導向社會那樣緊隨某一社會參照體系」⁴³，而更多以自身和當下為原則，現代人的社會世界，「不〔再〕是先於全部共同生活和互相體驗過程而形成的形而上實體，毋寧說，它們只不過永遠是在與其他人共處的經驗中不斷重新形成自身的精神主體和心理內容」⁴⁴。訴諸中國，讀書人曾將「前人世界」的學問視作唯一的信仰。到1894年，新聞紙才將人們的思慮普遍轉入「共同世界」。這個世界的坐標，就空間而言，定位於一場超越耳聞目見、不再限於朝廷內部的戰爭，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對國家事務的公開關注。

就時間而言，報紙向來追求「現在」。沃爾夫(Daniel Woolf)曾注意到，中世紀的歐洲人，普遍缺乏一種持續的、現在的概念，因為人們只能閱讀小說和歷史書這些缺乏現在感的文本。十五世紀以後，報紙的出現改變了這一狀況⁴⁵：

新聞創生了持續而非瞬時的現在感。換言之，它在過去和未來之間刻畫出一個「去瞬時化的區域」(detemporalized zone)，即一個類似哈貝馬斯公共領域式的、供人們討論當下事務的空間。在這個區域裏，……人們捲入正在進行之中的事件，爭論且憂慮，並向求新意識和現代性邁出堅實的步伐。

中世紀的歐洲人依賴新聞擴張了現在感，1894至1895年的中國新聞紙讀者，亦從沉浸於過去轉向關注現在。1894年末，皮錫瑞的日記就生動地展現出一個具體的「去瞬時化的區域」：

十二月二十二日：閱初七、八《申報》，云張蔭桓、邵友濂兩鬼奴往倭乞和，紛紛調兵將何為乎？（《師伏堂日記》，第一卷，頁565）

十二月二十五日：《申報》言十一日張鬼奴到滬，將出洋。（《師伏堂日記》，第一卷，頁565）

十二月二十八日：歸閱《申報》，張鬼奴已碰釘子歸矣，陳舫仙、李健齊已至營口，與宋慶合。不和必戰，未知勝負如何。（《師伏堂日記》，第一卷，頁566）

這一階段的閱讀，一直延續到1895年正月二十六日，涉及的是同一件事，即清廷派出張蔭桓、邵友濂兩位使臣赴日議和（《師伏堂日記》，第二卷，頁10）。此事歷時月餘，方才塵埃落定。期間，皮錫瑞一直追隨《申報》密切關注此事，這種延伸了的現在感，是閱讀儒家典籍時少有發生的。

根據以上討論，我們可以說，作為一種「現代文化形式」，新聞紙在傳統讀書人的精神氣質裏，形塑了一種「追求現在、關心國家」的現實主義精神，這種精神與儒家傳統之經世思想的現實主義有原則上的不同。黃仁宇曾將明末官員倪元璐的行事風格命名為「政治現實主義」，其人特別之處，在於廣泛掌握了關於實際問題的知識，譬如賦稅、田產、財政、軍事等，「倪元璐的態度及行為，既不是革命性的，也沒有驚人的原創性，但卻與十七世紀大部分的學者官僚不同」^④。

倪元璐身上體現出來的「現實主義」，源自儒家固有的經世思想。這種精神自宋代後曾日趨淡薄，不過在清代嘉慶、道光兩朝又再次復活，《皇朝經世文編》廣泛流傳，其內容「大部分是關於官僚制度和技術性問題，如銓選、賦役、鹽務、漕運、河工、水利等」；講究的是「如何由制度的安排、政府多種政策的運用以及法令法規的約束以求政治社會秩序的建立」；反映了清代中葉以後，「經世思想重實際、重實效的趨勢，是一種功效性強化的表現，但也意味着當時經世思想的批判精神日趨淡薄」^⑤。毫無疑問，經世思想含有某種現實關懷。不過，嘉、道兩朝興起的現實主義，具有明顯的局限：第一，它以致用為目的；第二，以政府施政為立場^⑥。換言之，它雖然鼓勵讀書人入世，但往往是以關注政府的實際事務為終點，它是「行政」的而不是「政治」的。

報紙形塑的現實主義，既沒有「致用」的實際功能，又超越「朝廷」的立場。如張灝所說：「十九世紀後半葉，中西方思想相撞的一個重要結果是晚清的『經世』傳統逐漸從道德和行政上的改良主義思想轉變為一場有關傳統中國政治的一些根本原則的『政治變革』。」^⑦報紙參與了這場轉變，它不僅將讀書

人從「前人世界」解放出來，也將他們從一種現實帶入另一種現實——即從立足朝廷、關心實際事務與「周遭世界」的現實，轉到以國家為主體、毫無實際功用、超越個人聞見的政治現實。這種無用的政治現實主義，恰是現代意識發生的搖籃。

誠然，中國古典心靈偏向「內向的自我完善」^⑩，但本文所討論的「古典心靈的現實轉向」，並非止於從「無現實」轉向「有現實」，亦包含從一種現實轉向另一種現實的意義。十九世紀末期，閱讀報紙培養了人們對國家事務的普遍興趣，激發了人們自我定位、安身立命的需要。因此，艾爾曼 (Benjamin A. Elman) 曾批判的那個群體——「中華帝國晚期早已存在一個廣泛的閱讀群體，由於科舉制度的存在，他們精於閱讀和寫作，但並不是閱讀公眾的一員」^⑪，在 1895 年後已發生心態的轉變。在他們的精神氣質中，我們已隱約看到「公眾」的微光。

註釋

- ① 相關討論參見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頁 530-50；張灝：《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頁 134-52。
- ② 「現代文化形式」一語，是筆者綜合凱瑞、舒德森兩人的論述而成。參見凱瑞 (James Carey) 著，丁未譯：《作為文化的傳播：「媒介與社會」論文集》（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頁 11；舒德森 (Michael Schudson) 著，劉藝娉譯：《新聞的力量》（北京：華夏出版社，2011），頁 3、48。
- ③ 許紀霖：〈近代中國城市的公共領域〉，載高瑞泉、山口久和主編：《中國的現代性與城市知識份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 67。
- ④④ 張灝：《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頁 34；88-89。
- ⑤ 柯文 (Paul A. Cohen) 著，雷頤、羅檢秋譯：《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頁 53。
- ⑥ 伯克 (Peter Burke) 著，楊豫等譯：《歐洲近代早期的大眾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頁 312、317、326。
- ⑦ 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頁 35、43。
- ⑧ 參見 Karin Wilkins, "Considering 'Traditional Society' in the Middle East: Learning Lerner All Over Again", *Journal of Middle East Media* 6, no. 1 (2010): 1-17。
- ⑨ 參見孫寶暄：《忘山廬日記》，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皮錫瑞：《師伏堂日記》，第一、二卷（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蔡元培：《蔡元培日記》，上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張桐：《張桐日記》（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
- ⑩ 羅志田：《近代讀書人的思想世界與治學取向》（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 3。
- ⑪ 魁奈 (François Quesnay) 著，談敏譯：《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頁 62。
- ⑫ 王鴻泰：〈社會的想像和想像的社會〉，載陳平原、王德威、商偉編：《晚明與晚清：歷史傳承與文化創新》（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頁 139。
- ⑬⑬ 參見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一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頁 209；236-37。
- ⑭ 張仲禮編著，李榮昌譯：《中國紳士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頁 198。
- ⑮ 韋伯 (Max Weber) 著，康樂、簡美惠譯：《中國的宗教：宗教與世界》（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頁 182。

- ①⑥ 加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哲理詮釋學的基本特徵》，上冊(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頁368、369。
- ①⑦①⑧ 希爾斯(Edward Shiles)著，傅鏗、呂樂譯：《論傳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頁32；11。
- ①⑧③⑤⑥⑧⑨ 舒茨(Alfred Schutz)著，游淙祺譯：《社會世界的意義構成》(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頁271；186、280；210；186、271；233-34。
- ②④① 塔爾德(Gabriel de Tarde)著，何道寬譯：《傳播與社會影響》(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頁305；237。
- ②① 計六奇：《明季南略》(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之一，頁7。
- ②② 巫仁恕：〈明清之際江南時事劇的發展及其所反映的社會心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9年第31期，頁8。
- ②③ 司徒琳(Lynn A. Struve)著，李榮慶等譯：《南明史，1644-166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頁2。
- ②④ 伊帕托娃(A. C. Ипатова)著，尹懷邦譯：〈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及戰爭以後的中國〉，《清史研究通訊》，1990年第3期，頁22。
- ②⑤ 曾國藩：《曾國藩全集·日記一》(長沙：嶽麓書社，1987)，頁42-43。
- ②⑥ 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北京：三聯書店，1995)，頁163。
- ②⑦③⑩ 瓦格納(Rodolph Wagner)著，徐百柯譯：〈進入全球想像圖景：上海的《點石齋畫報》〉，載劉東編：《中國學術》，第八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頁41；42。
- ②⑧ 〈邸報別於新報論〉，《申報》，1872年7月13日。
- ②⑨ 黃琴塢：〈癸丑日記(上)〉，《近代史資料》，1999年總第114號，頁20。
- ③② 竹內郁郎編，張國良譯：《大眾傳播社會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9)，頁25。
- ③③ 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著，倪偉譯：《漫長的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頁188。
- ③④ 姚公鶴：《上海閒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頁129。
- ③⑦④⑩ 羅素(Bertrand Russell)著，陳啟偉譯：《我們關於外間世界的知識：哲學上科學方法應用的一個領域》(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0)，頁48；259。
- ④② 卡西爾(Ernst Cassirer)著，甘陽譯：《人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頁56。
- ④③ 理斯曼(David Riesman)等著，王崑、朱虹譯：《孤獨的人群》(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11、15。
- ④④ 舍勒(Max Scheler)著，艾彥譯：《知識社會學的問題》(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頁68。
- ④⑤ Daniel Woolf, "News, Hist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esen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in *The Politics of Inform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ed. Brendan Dooley and Sabrina A. Bar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108.
- ④⑥ 黃仁宇：《現代中國的歷程》(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61-62。
- ④⑧ 劉廣京、周啟榮：〈皇朝經世文編關於「經世之學」的理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6年第15期上期，頁84。
- ④⑨ 張灝著，崔志海、葛夫平譯：《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頁14。
- ⑤⑩ 劉子健著，趙冬梅譯：《中國轉向內在：兩宋之際的文化轉向》(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頁8-10。
- ⑤① Benjamin A. Elman, "The Social Roles of Literati in Early to Mid-Ching",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9, pt. 1, *Ch'ing Empire to 1800*, ed. Willard J. Peter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375.